

从经世 到启蒙

—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李双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经世到启蒙

——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李双璧 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

经新闻出版署 (91) 图管字 90 号文件批准出版

责任编辑: 廖东进

从 经 世 到 启 蒙

——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李双璧 著

中 国 展 望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810)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1/32 印张: 11 字数: 260 千字

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050-1036-0/C·58 定价 8.2 元

序 言

丁守和

中国近代化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失败、西方侵略者侵入中国的时候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就不断探讨中国失败及一步一步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与教训，寻求改变现状和救亡图存的出路。他们勇敢地揭露中国封建统治的腐败及其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同时也抨击专事考据训诂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提倡“经世致用”，励精图治，进而主张“借法自强”、变法维新、反清革命，乃至启蒙救亡，实际上都是力图使中国进步，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近代变革思想和近代化思想，无不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或者说是以其为逻辑起点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思潮和近代化问题，必然涉及经世致用的传统思维。

传统“经世致用”思想起源很早。黄宗羲就说过：“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今水经序》）以儒学而言，自始就是一种有体有用之学。“经义”与“治事”并非如后人那样划分的界限分明。《大学》开宗明义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中庸》则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就是说，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个体的内在修养，并以此为出发点，推衍成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略，其落脚点还是在“为政”、“治国”上

面，此即为“通经致用”者也。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内圣”功夫被突出到本体的地位，“外王”之道则相对有所忽视。程颐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矣。中正而诚，则圣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于是，所谓“内圣”之学成了于国计民生无关的“心性之学”。到了明代后期，士大夫们大都鄙弃事功，高谈性理，一时蔚然成风。“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遇到国家危难之际，士大夫们只能如此行事，明朝衰亡与此很有关系。清初顾炎武对这种风气大为不满。他痛斥道：“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曲，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七）有鉴于此，他大声疾呼：“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亭林集》卷四）

孔子不像西方的古代哲人那样，醉心于构筑精巧的思辨体系，而是执着于人生世道的追求。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始终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协调人际关系，如何重建礼治秩序，其全部理论的落脚点还是放在如何经世济民，如何安邦定国。他说过：“夫召我者，而其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为此，他自我揶揄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疏曰：“孔子欲不择地而治也。”可见孔子决不是那种耽于玄想、空谈性理的人物。他还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这就是说，“藏”不过是无奈状态下的内敛，属第二义；而“行”才是他的理性追求。正常状态下的某种期待，属第一义。后代理学家们未能看透这层意思，专讲“藏”其心于内，忽视“行”其于外，致使理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最终成了窒息思想、扼杀创造精神的桎梏。然而，儒学并未完全丧失“致用”的精神，每当社会政治处于危机状态，“经世”的观念就要萌发。明末是如此，清末也是如此。

清代嘉、道年间，社会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国势衰微，民生蔽困，西方侵略者始以鸦片贸易，继以舰船大炮叩击着中国的大门。这种绝非历史上诸小蛮夷环伺的“非常之变局”，促使了经世意识的复活和发展。林则徐的重事功和开眼看世界，龚自珍的尊史迹和呼唤风雷，魏源的反对“泥古”，“法古”，主张变古和“师夷长技”，以及其他抱有经世观念的士大夫们的呼应，遂形成了蔚然一时的经世思潮。它既是中国传统经世观念的一个发展，又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某种积极回应。尽管这种回应仍未脱离传统思维的圈子，但毕竟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方面，魏源的《海国图志》的问世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它不仅要求人们“论治以富民为本”，而且要求人们将目光射向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自此以后，“师夷长技”思想遂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讲求变革、救亡图存信守不渝的信念。不同的是，每一时代对“夷”或“洋”或“西方”之“长技”的认识和理解有所逐步深化而已。洋务运动时期，“洋”的“长技”为“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维新变法时期，西方的“长技”为“政教制度”；而五四启蒙时期，则深入到思想文化。不管时代主题如何变化，人们所提出的变革要求如何多样，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其内在的精神动力实际上仍然是经世观念，主张变革，鄙弃空谈，反对思想僵化，无不是传统经世观念在新的、变换不定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扬，虽然情况和程度不尽相同。在这里，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西方文化在交融、撞击的过程中，找到了恰当的或一定的切合点。

同任何事物一样，强调致用或实用的经世观念和思维，也给近代知识分子带来正副两方面的影响。其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推动观念的更新；二、促进实学的兴起；三、激发“师夷”即向外国学习的热情；四、导致经学的分化。急迫的时代课题逼使士大夫们再也无暇去袖手旁观，空谈性理。他们急于寻求救国良方，以御侮图强。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再株守先王之道，而从今文经学中寻觅变易之理，或从理一势的思维逻辑中探

求务实的途径。与此同时，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许多人不再醉心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更有不少人鄙弃帖括科举，而致力于边疆沿革、外国史地、世界大势的研究。与政治相关的盐务、漕运、河工、采矿、机械等“经济”之学也兴盛起来。从魏源帮助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开始，类似这样的“经世”之书绵延不断，就是一个明证。在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亦渐渐输入中国，从而为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历算、格物、制器诸学注入新的活力，并出现许多新的学科。新一代的科学家开始诞生。更重要的是，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勇于破除夷夏之防的陈旧观念，努力向西方学习，寻求新的知识。他们的学习虽然还是邯郸学步，未能得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粹，但毕竟是个良好开端。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工矿企业、交通、邮政、学校、报刊等渐次兴办，适应近代化要求的外交机构、驻外使节、派遣留学生等也都着手建立和进行。总之，经世观念作为一种潜在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进而推动了近代化事业的发展。

但是，也不能忽视传统经世观念消极或负面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未能从整体上把握西方文化的特质；二是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色彩。亚里斯多德在论述希腊哲学的起源时说过：“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脱出愚蠢。显然，他们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则是把经世致用作为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暴风雨般的冲击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是被迫向西方学习的，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总是那么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缺乏汉唐时代那样的胸襟和胆识，而学习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快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救亡图存始终是缠绕近代中国人脑际的中心课题，而富国强兵则是有效抵制外国侵略的主要途径。这个目的虽然有限，但却非常具体。因此，急用先学，拿来就用，用则立求生效。至于如何消化，如何适合中国国情，尚未静下来仔

细思考。是故生吞活剥者有之，曲解误会、削足适履者亦有之。为救国或是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张，或是竭力弘扬本国传统。可是，无论是西方学说，还是本国传统，都缺乏一种深沉的理智的科学的索隐求贖。正因为如此，一种理论既可以否定现实的存在，也可以用来为现实辩护。如同样的孔教，守旧人士认为它是中国现实生活不可或缺的，激进人士则认为它与现实生活冰炭水火，绝不相容。同样达尔文的进化论，既可以用来鼓舞国人斗志。又可以用来宣泄悲观绝望的情感，等等。中国人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所以步履维艰，踟蹰失措，与传统文化那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经世观念和实用思维不无关系。总结前人的教训，以利后人前进，总是有益的。

李双璧同志的《从经世到启蒙》一书，从分析龚、林、魏等人变革思想的不同特点入手，进而指陈了经世思潮勃兴的背景和原因，以及这一思潮与洋务思潮的逻辑关系，从而抓住了近代变革思想发展的“文化基因”，能给人以一脉贯通的深刻印象。无论是洋务思潮，还是尔后的维新思潮、革命思潮、启蒙思潮，“经世致用”观念始终居于思想范型的重要地位和起着文化动力的作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特点。

本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一、作者有明显的历史主体性和参与意识，甚至有“六经注我”的味道。作者引用的多是常见的史料，然而能由此进行深入的剖析，得出许多新的见解。二、作者把握“近代化”这个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在论述各个思潮的不同风貌和特征的同时，着重分析了时代主题与思想反映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中国人在为实现近代化的努力中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和不足之处。如此下笔，自然会给人以较多的历史启示和深思。三、在方法论上亦有新意。作者运用较多的文化学理论，采取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对各种思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了深入的辨析。有些地方可成一家之言，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本书文字生动流畅，一反史书的沉闷旧貌，有较强的可读

性。这些概括未必十分准确，但读读这本书，对于了解近代变革思潮的发展和近代化的历程，确为有益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

前 言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一本名叫《消闲演义》的小书。书中写道：

为此一场兵祸，遂弄得海氛迭起，貽毒百年，堂堂华夏，竟被外人窥破，把我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看得一钱不值。^①

此情何以堪！在这场战争中，堂堂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竟被蕞尔岛夷看得一钱不值，真可谓奇耻大辱。

一百四十年前，西方强盗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民跌入了灾难的深渊。近代历史第一页，记录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中国朝近代化道路迈出的第一步，就如此的不顺利，这不能不对今后八十年的艰难旅程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是中国人民在沉沉黑夜、漫漫棘丛中一步一个脚印苦苦求索的八十年。中国历史的转型来的过于突然和剧烈，以致人们毫无思想准备，更无应对之方，一切都只能凭直观感觉。此时的中国，衰弱不堪尚在其次，而其晏然高卧、长眠不起才是主要问题。昧于世界大势，厄于人才困乏，斤斤于夷夏人防，断断于古今之辨，整个社会除了少数明达之士能看出危机所在以外，绝大多数人仍旧是恬然自熹，毫无知觉。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升级，人们的危机感也一日强似一日，由此而引发的耻辱感和进取心也与日剧增，要求尽快摆脱落

^① 转自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后挨打厄运，尽快实现民富国强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在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精神失落、信仰崩解、传统贬值和文化反省。

在人类文明史上，还很少有一种文化能象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在维系传统社会的稳定性方面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极为广泛的影响。中国文化远播海外，以致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甚至对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于它的“一体性”，从横的方面看，它有一套所谓“义理”之学统括各门学科；从纵的方面看，它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统绪（“道统”）以贯通古今。简言之，中国文化的“一体性”即指中国文化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具有与西方文化全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政治上有分有合，经济上有衰落有兴盛，但这种“一体性”的文化统系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它有容纳百川的胸襟和及时应变的能力，只是到了明清以后才逐渐地僵硬起来，再也无法恢复汉、唐时代的恢宏和大度。

迨至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终于受到严重的挑战。传统文化中不适应近代化要求的那部分内容，诸如重道轻器、重本轻末、贱视工商、夷夏大防、强调人治卑视法治、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家族制度和士绅政治、崇古守常思想等等，成了阻碍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历史包袱，是很难步履轻捷的，因此，要想急速迈向近代化的通途，就只能义无反顾地抛掉这些包袱。不幸的是，中国人时隔很久才意识到这一点。

当今人类社会经历着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历史转变，那就是实现现代化。^① 对于中国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化历程，实际上就是当前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初始阶段。中

① 海外及台港学者论及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多与近代化问题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尽管这种区别是非本质的。

国在近代化运动中的遭际，近代中国人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种种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经验教训，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世界现代化运动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具有全球性，即世界任何国家无一例外，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不管其文明程度如何，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其总体目标都是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免遭淘汰命运。二，它必须是一体化的，即现代化的内容既包含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和观念形态的现代化。尽管现代化是以科技为先导，以工业化为基础，但它却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现代化道路有二：一是内发性的；一是外发性的。前者如英、美，是社会机制演进的结果；后者如日、中，是在外力逼促下借助前者经验而被动发展的结果。就速度而言，后者未必输于前者，只要借助得法，后者甚至可能大大超过前者，如日本即是。按照这一现代化理论来观照中国近代史，其基本线索已十分清楚，那就是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的问题。^①如果能，又是怎样实现的问题。围绕这个中心议题，近代中国人写出了一篇篇感天动地的大文章，经历了一次次艰苦卓绝的大磨难，最后终于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有了新的建树，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中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祿日来。”这里的所谓“更化”系指崇儒，而“更化则可善治”即

① 近代确有人将近代化视之为“全盘西化”（如陈序经），但那只是少数人的意见。胡适认为“全盘西化”口号容易引起误解，不如改为“充分世界化”较为明了。对这个问题，海外学者余英时有一段很精辟的评述。他说：“全盘西化虽然是一种幼稚的错误，但这一概念的本身确已明白的指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只在科学、政治制度……等等枝节的革新，而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全面改造。仅此一点，五四的功勋便足已永垂不朽了。”（转自《胡适与中西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

指一个有效的合理的政治统治方式必须以一定的文化结构和观念形态为基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许大有可议之处，但他所确定的这条原则却是亘古不移的。具体到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而言，中国人民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推行工业化建设，加快近代化步伐，最终还是需要有个文化重建的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近代化问题，起始是表现为“富国强兵”，再次是表现为“政制改革”，最后则表现为“文化革命”（陈独秀语）。没有近代化的人，其他一切近代化都只能是沙上筑塔；而具有近代意识和近代素质的人，又只能产生于适合近代化总体要求的文化环境之中。^①

近代变革思想是变革时代的思想反映，是指导社会变革运动的理论先导。它的演进有其特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既符合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则，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基本上是个适应性变迁的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外发性特点至为明显的缘故。因此，人们要求变革的意识和所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外力强刺激下的某种回应。这一点，可以从本书所述各章中略知梗概。近代变革思想历经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启蒙思潮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广度来看，人类活动的五个方面（知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②）的现代性要素亦表现在这一逻辑过程的每个环节里。因此，在分析近代变革思想的演进过程时，除了要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外，还需要运用文化学的知识和系统分析的

① 汤一介在一篇文章中说：“现代化不能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深层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等。只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而没有现代化的人，实现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当前中近东某些地区的现实就是例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

② 参见布拉克在《现代化的动力》（台北环宇出版社1972年版）中的分析。

方法，庶几才能对时代变革与思想变革的关系，对变革思想各个阶段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做出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and 评判。

研究思潮史应该把握住两个要点：一是着重考察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思想倾向；二是注意了解此一时期思想界、舆论界的一般反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向来都是由政治文化的优秀分子来控制的，他们的政治经验、文化素养、思想的敏锐性以及对于异质文化的反应能力，都是其他阶级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就是“士、农、工、商”中的“士”。在近代，“士”这一阶级发生了分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恪守传统，反对变革，成了阻碍近代化运动的顽固保守势力，而另一部分（占少数）人则锐意进取，勇于革新，敢于汲取新知，大胆提出新主张、新见解，担负起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任。这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尤其是杰出人物的思想倾向，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些代表人物身上，还不足以反映出“思潮”蜂涌的全貌，因此，在研究“点”的同时还应注意“面”的研究，最终使变革思想演进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状态凸现在人们面前。本书未必能达到这个目的，但却是笔者的希望所在。

为有志于祖国现代化大业的朋友们写的这本书，是笔者多年来努力探索的结果，其中有些看法或有不当之处，有些分析未必十分精到，但它毕竟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成王成寇，只好留待读者评说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丁守和先生为本书作序，套一句熟语，他的序确使本书“蓬荜生辉”。

作 者

1991年4月于望岳楼

目 录

序 言	丁守和
-----------	-----

前言

第一章 引论：走向近代化	(1)
--------------------	-----

- | | |
|----------------------|------|
| 一 痛苦的历史选择 | (1) |
| 二 变革思想阶段性与文化结构 | (11) |
| 三 传统、变革与爱国主义 | (22) |

第二章 “经世致用”与“师夷长技”	(35)
-------------------------	------

- | | |
|-----------------------|------|
| 一 龚自珍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体认 | (35) |
| 二 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 (42) |
| 三 魏源的“师夷长技”的主张 | (48) |
| 四 经世思潮的勃兴 | (57) |

第三章 天国的梦想	(66)
-----------------	------

- | | |
|-------------------------------|------|
| 一 洪秀全的天国梦 | (66) |
| 二 一个难以施工的蓝图
——《资政新篇》 | (76) |
| 三 梦幻的破灭 | (82) |

第四章 洋务“新政”的鼓吹与实践	(89)
------------------------	------

- | | |
|---------------------------------|-------|
| 一 “三十年变法之萌芽”
——《校邠庐抗议》 | (89) |
| 二 洋务“新政”的主持者：曾、左、李 | (97) |
| 三 同光“新政”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 (108) |
| 四 新与旧的两场大辩论 | (116) |

第五章 洋务思潮的深化	(127)
-------------------	-------

一	传统的“道本器术”论与 郭嵩焘的新洋务观·····	(127)
二	“求富”：洋务思潮的深化表现之一·····	(136)
三	“治本”：洋务思潮的深化表现之二·····	(145)
四	洋务思潮的理论核心：“中体西用”·····	(157)
第六章	维新思潮的激荡·····	(167)
一	救亡的呼声·····	(167)
二	“托古改制”：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理论构架·····	(175)
三	明智的选择：维新派的政治改革方案·····	(186)
四	知识分子近代意识的觉醒·····	(197)
第七章	“天演”与“新民”·····	(210)
一	“民智渐开”·····	(210)
二	“物竞天择”：近代变革思 想的最高理论表现·····	(221)
三	“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237)
第八章	革命是改革的变型·····	(250)
一	革命还是改良·····	(250)
二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与民主建国主张·····	(262)
第九章	五四启蒙思潮：近代变革 思想演进的逻辑终点·····	(283)
一	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	(283)
二	请出“德先生”、“赛先生”·····	(294)
三	人的解放与国民性改造·····	(307)
第十章	赘语：一束启示·····	(322)
后 记	·····	(332)

第一章 引论：走向近代化

一 痛苦的历史选择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①

谁都知道，这段呼唤变革时代到来的慷慨陈词，出自“维新派钜子”梁启超之口。梁任公的这段话，不仅仅是戊戌变法时代的最强音，而且也是整个近代历史观念形态发展特征的最高概括。一个“变”字，道尽了多少辛酸和痛苦、迷惘和困惑、追求和企盼、奋进和苦斗。在“变”的感召下，多少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献身，为之探索。他们的努力，是中华民族至今不曾沦亡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思想，是引导中国人民昂扬奋进的基本动力。如果说，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描述中国如何艰难地步入近代化的历史的话，那么，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以“变”为中心内容的变革思想演进史。“变亦变，不变亦变”（康有为语），这是一条谁也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在中国近代，这条规律尤为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